

和谐得忆天师

○ 马国馨（1965届建筑）



一九八九年于杭州
关肇邨先生与马国馨（右）

2022年12月26日关肇邨先生去世。从我们入学至今，在先生教导下已六十余年，先生的去世，令我和老伴关滨蓉深为悲痛。

在大学时，到了三年级公共图书馆设计时才第一次受教于关先生。先生给我们讲解设计原理时，用了许多手绘的透视图，表示公共建筑设计的视觉过程，由体会而受到启发，给同学留下深刻印象。在设计课时，关滨蓉在关先生辅导的那一组，我在汪坦先生辅导的那一组。在学校时，关先生给人的印象除了儒雅的风度、丰富的学识之外，还有低调、高冷的印象，因此毕业之后的前几年基本没有交往。

20世纪70年代末，清华建筑系从铁道兵施工队伍中考招了一批学员，准备培训学习后为国防工程服务，在两年半的时间内要学完相关课程。这些人毕业后大部分分配到关滨蓉所在的铁道兵地铁设计院。这些学员知道老关也是清华毕业的，于是谈起他们的学习过程。为了克服学员学习上的困难，老师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尤其是关先生和王炜钰等老师对他们无微不至

的照顾和关心，甚至毕业后还专门对他们进行辅导，还赶来参加他们的婚礼，让他们十分感动。这也改变了我们过去对先生一贯高冷的印象。

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从日本研修回国，准备筹备亚运会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件事情。那时，关滨蓉在总政中国剧院设计组，但立面方案迟迟没有决定。老关给我说了以后，我就为剧院画了三张立面方案的透视图交她带到设计组。在专家们讨论这几个方案时，听说开始时也是意见分歧无法定案，后来关先生力排众议，选中了方案中的有竖向壁柱加装饰花纹的方案，很快大家意见集中决定采用。最后剧院临街主要西立面就是按方案图的想法实现的。这等于是我研修回国之后向关先生的一次汇报。

从1989年起，关先生和我参加了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的筹备、成立及后续工作。筹备是由张钦楠和刘开济二位负责，我因和刘总同为北京院，所以参与辅助相关工作，和关先生同为筹委会成员。1989年10月在杭州成立大会后，关先生是理事会成员，我是理事会的副秘书长兼工作人员，后来在分会下成立各研究会或联络组共七个。关先生和刘总等负责建筑创作理论研究会，我和刘总负责体育建筑联络组，各研究会此后分别展开学术活动，我第一次和关先生合影就是在杭州开会时留下的纪念。后在1993年11月第二次理事会上，我也成为理事会成员，并和先生一起负责建筑创作学术委员会的活动。记得

学会要评选优秀论文奖，要求各专业委员会提出一个名单，先生正好要去东北讲课两周，所以写信把工作布置给我，来信时称我为“国馨弟”，真让我受宠若惊，诚惶诚恐。

1992年11月，建筑师分会在湖南长沙举办学术活动。那次参加的人员中，除80岁的张开济总辈分最高外，许多前辈如罗小未、关先生、彭一刚、聂兰生等和我们一起参加了考察，这使我们对这些平时仰望的学界前辈有了进一步的熟悉和了解。

与关先生逐渐熟稔了以后，又发现了若干可亲近之处。一是先生的高中是在北京的育英中学，我读的65中就是原育英中学高中部，于是我们增加了一层中学校友的关系。先生和我老伴都姓关，同为满族，虽然先生是出身官宦，而我家老关是当时的“贫下中农”，但总是又增加了一份亲近。尤其是1997年我当选院士以后，在每次开年会的期间，总要上关先生的房间聊上一阵子。后来听到工程院钱易院士向我介绍先生在鲤鱼洲的一件轶事，让我对先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时先生和王乃壮先生等一起劳动，接受“再教育”。王先生平时口无遮拦，经常受到工宣队的批判教育，因此十分苦恼，这时关先生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随身带上一个小瓶子，每当自己要讲话时，就先用手摸摸小瓶子口，想起“守口如瓶”的教训，就可以控制住自己了。可谁想王乃壮先生刚刚忍不几天就故态复萌，不但继续受到批判，还不经意间把小瓶的事也供了出来，连带关先生也受到批评。听了这以后，我以为关先生还是有小幽默、大智慧的，以后在先生面前，我也慢慢“胆大妄为”起来。

此间我也注意到，先生是属于那种作

而不述、讷言敏行一类的学者，发表的文章并不太多，也就是在清华图书馆新馆设计过程中，先生才陆续在《建筑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文字。1988年第七期学报上发表了先生的《尊重历史、尊重环境、为今人服务、为先贤增辉》的介绍新馆的文章，先生提出了“建设和谐统一的建筑环境，尊重历史，尊重有历史价值的好建筑，尊重前人的劳动和创造，应是今天在旧建筑群中设计新建筑的重要原则。”“如何在解决好使用功能的同时，解决好建筑群中礼堂与它的主从关系。在构图上不压制旧馆，使两者相得益彰，是设计中始终要努力解决的重要而困难的课题。”也就是“应对具体任务时，要做深入分析，突出其与其他任务的不同的特点，加以强调和发挥。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至于因人制宜，不强求做作，但是个人风格应服从于整体则是我们应当肯定和提倡的。”

1992年清华图书馆新馆竣工之后，先生又发表了《重要的是得体，不是豪华与新奇》一文，这是先生学术生涯中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20世纪90年代初先生参加全国各地的学术活动后，看到当时各地以“后现代”之名，简单拼贴一些世俗的、肤浅的、商业化的符号，他认为这是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而作为清华图书馆这种具有悠久历史的高校中的学术文化象征，则要努力发掘清华历史中的“集体记忆”，“追求的目标就是建造一个能为清华人包括离校多年的老校友所能认同和接受的建筑与环境，使人们在不确定其为何地的情况下能判定它应该是清华园中的一部分”。所以“设计中从总体布局到细部设计，没有追求一点新奇和与众不同，着

□ 怀念师友

力点只在于争取做到符合于这一特定建筑的性质、历史、环境和身份”。先生提出的“得体”，在清华图书新馆上得到完美的体现，也得到业界的普遍认同，成为文化类建筑扩建的经典之作。正如先生所主张的：“好的设计应能做到时间愈久，愈能显示其感人的力量，永不过时。”

先生在文章中也提出：“我始终怀疑把创新作为衡量一个建筑设计优劣的主要标志的观点。”“建筑师不应强调个人风格或以个人的好恶强加于人，而要努力以自己的设计满足群众的需要。”这很容易让人引起封闭、保守、中庸的联想。但著名精神哲学家、印度学专家、宗教学家、翻译家和学者徐梵澄先生曾论及过得体，他认为：“青年不作老耄语，僧道不作香艳语，寒微不作富贵语，英雄不作闺彦语……如此之类。譬如人之冠服，长短合宜，气候相应，颜色相称，格度大方，通常不奢不俗，便自可观。是为得体。不必故意求美。善与美，孔子已辨之于古。诗要好，不必美。如书如画皆可。”时下也有学者论及杨廷宝先生的设计哲思是“得体合宜”，也就是“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的水准和境界，即感受不到自己强烈的个人风格，而只是“将时代风气和因地制宜两个方面不动声色地结合起来”。所以关先生的得体说实际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创新，是达到了更高层次、更为圆融、更为自由、更为和谐的成熟境界，这是我们一般建筑师难以企及的境界。

另外一件先生特别操心的事，也可能是先生认为自己在清华校园中最后的收山之作，就是位于同方部后面的清华校史馆。后来在清华百年时，校史馆与新清华学堂建在一起了，关先生就做了清华学堂

扩建及其北部空间整治概念方案，准备把同方部后的动振小楼拆除，对清华学堂北面的新水利馆、电机馆、同方部等加以组合和扩建。我看了先生2002至2010年作品选集之后，曾写信给先生谈了自己的看法：“感到任务书似很不完备，看不太出其功能与校史相关的内容，似也没有什么展示部分，另立面门头部分好像宽了些（先生原意是模拟“三院”的门头），尤其是从罗汉墙经石墙，又经大玻璃，有些平均，与同方部的衔接好像还可改进，学生寸见，仅供关师参考。”

先生在2017年国庆之前写了一封长信谈及此事：“由于我在清华国内住了70多年，不免对这环境非常熟悉，且对一草一木都有了感情。其实我之所以想盖个房子，在清华学堂（工字厅之外，国家重点文物中之最老的），而现在楼的后面，又破又乱，应当把它整理一下，所以此项目并非有业主委托设计，而是我自己为了母校之完整美观，自己出的题目。想当初我初来清华，学堂是校领导办公之处，我曾在此见过梅贻琦、周培源等人，也看过他们的办公室、接待室、会议室等地，所以我觉得把它扩建为校史馆是最为得体的，甚至可以选几个主要厅室展示一下室内家



马国馨夫妇与关肇邨先生（中），2012年于清华

具布置，岂非是真实的历史展示。所以就完成这个设想，而根本没有什么任务书，并天真地想2011年为清华百年校庆，时任总书记胡锦涛是清华水利系校友，校庆一定会来校（真的来了）。新水前太杂乱，当总书记看完水利系出来应给他一个好印象，所以主要从外表和谐出发，在楼北向正对新水处扩建一些较高档厅堂。因我在美曾看过一些名校的校友会大楼，其华美不亚于一个欧洲的大宫殿，如能建成岂不一举数得吗？当时的校长也很支持，于是就画了草图上报。不料当时的北京文物局领导怕犯错，每次报上去，总是说‘研究研究’，如此每年催报，每年要再研究一下，直至拖至他下了台。而离2011年已不足4~5年，另怕届时赶不出来，便令李道增设计的新清华学堂（俗称大菠萝）临时缩小音乐厅，挤进一个校史馆于其中，结果把李也忙得不亦乐乎，校史馆长也感到很遗憾。

但我雄心未死遂和校友总会秘书长某教授商量，得校友会的高度认可，并因此多人多次到欧美名校访察。西方大学的经费大多来源校友，都是顶级大款，经常返校聚会，所以校友会大都是豪华至极。我校校友会遂提出一个计划，但未经校务会通过，仍未成功。

近年外国来校交流、教学的专家多了，校方终于同意建一个高端学术活动中心之类的建筑，原报过的校友会之类的方案已经北京市各有关领导机构审定通过，特别是文物局批件甚严格，所以外形与清华学堂及同方部的关系定的很死，造成设计有些困难，这对我已是莫大的‘恩宠’，也没有精力再去和他们争取了。能在有生之年亲眼见它站立在那里，就是最

大的愿望了。”

从长信中可以看出先生作为老清华人对校园的深厚感情，对于校园空间的完善和扩充的拳拳之心，但现在看来也是先生的遗憾了。难得收到先生写了如此的长信，披露了自己的心境，这已成为我宝贵的珍藏了。

2017年10月，是先生88岁米寿的日子。那年是中秋、国庆，加上先生米寿，三喜临门，又考虑节前快递十分繁忙，寄送会延误，所以提前一周给先生寄去小小寿礼和另一首打油诗，请先生晒正。

执教近七秩，桃李遍五洲。

华园树精品，神州绘琼楼。

立论推得体，和谐蕴风流。

中秋臻米寿，期颐信可求。

2019年9月是中国建筑学会“梁思成奖”的发奖仪式，见到先生走路时已经需要一根拐杖了，所以在进入科学会堂从后面走到第一排时，我一直搀扶着先生，在休息室里也抓紧为获奖的冯·格康先生拍照，给先生拍了照，还和先生合了一张影，这是最后一次和先生的见面了。

当然此后我们就多靠书信和电话联系了，先生身体状况日渐衰弱，时有住院，就多和孔师母通话了。2020年，先生捐献100万元设立奖学金，得到社会和业界一片赞扬。同年12月，先生电话中问起梁思成奖历届都有什么人获奖的事，我赶紧查阅了一下，写信回复。当时已经在新冠疫情之中了。时过平安夜，所以我写了：“平安夜已过，看来大家都还平安，只是希望庚子年尽快过去，辛丑牛年会好一些吗？”这也是我写给先生的最后一封信。

2021年4月校庆之前给先生打电话，师母接的电话，说到先生的身体不理想，

□ 怀念师友

一是心衰，二是肺部有积液，三是肾功能不好，脚肿。住了医院，但对那里很不适应，对护工也不适应，后来回家来才觉自在些。正说之中，先生回来了，没有讲几句，只记得说为住院给先生剃了光头。

2022年2月1日春节打电话去先生家问候，孔师母告诉我，先生已经装了心脏起搏器，心衰问题解决了，但是腿肿、肺部积液没有起色，牙齿也不好。去住院，尤其在疫情之中更不适应。师母说，先生相信季羨林老人的养生之道，但是对自己的各项指标也搞不清楚。

2022年7月1日是先生设立的基金的颁奖，我是线上参加。在结束时看先生讲

话，明显感到先生老了。第二天正好我家有点新鲜荔枝，是先生老家广东产的，所以给先生闪送去一些，正好先生起来，在电话上说了一会儿。为了安慰先生，我还特地告诉他胡正凡同学为他相面的事。胡正凡说关先生是“罗汉之相”，如无大病，定可长寿。这是和先生的最后一次通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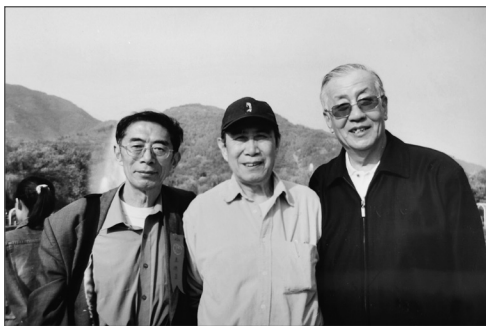
2022年10月4日是好几位同学和同事的生日，也是先生的生日。打电话过去时，先生已休息了，是他儿子接的电话。再后来，就是先生去世和羽化升仙的消息，以及对先生的思想和创作、对先生的言谈、对先生的音容笑貌的无限思念了。

2023年4月6日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追忆我国著名太阳能专家王德芳

○刘 泰（1954届土木）



毕业50年相聚北京植物园，左起：王德芳、赵荣义、刘泰

王德芳同学于2020年8月23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7岁。这位一生奋斗在大西北，致力于将清洁能源运用于人类进步与文明的清华人，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青年

时代的理想和誓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王德芳，上海市人，1934年12月出生。1952年从上海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响应国家号召转入国家建设紧缺的清华土木系暖通专业，毕业后奔赴大西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先在西安煤矿设计院工作，1970—1981年在兰州煤矿设计院靖远县旱平川设计队工作，1981年后在甘肃省自然资源研究所工作。195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谈吐文雅，一丝不苟，举手投足间有一股运动员般的朝气与活力，特别是他平时的走路，行走轻捷，大步流星，这是王德芳留给同事们最深刻的印象。